

的現實關懷。他對於臺灣海盜問題的研究，除了從海洋社會角度理解海盜的產生，還對比中華民國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態度和措施，強調了海盜絕不是歷史問題，至今仍需要各國共同協作，維持地區海洋社會的秩序。

綜觀此書，雖然只是一部論文的結集，其中卻貫穿着松浦章的海洋史觀，以及他對於清代海洋活動的重視。在這樣的主線之下，呈現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個案分析、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從而勾勒出東亞海域社會的多重圖像，足為後起者參考借鑒。

黃忠鑫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楊妍，《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民國初期省籍意識的政治文化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291頁。

《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民國初期省籍意識的政治文化分析》運用政治文化、歷史及比較現代化等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中觀層面出發，對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意識的關係進行探索，以當時主要的報刊、雜誌、專著為基本史料，尋找政治事件之展開的動因，動態分析政治體制及其演變脈絡，提出作為地域主義的省籍意識，一方面是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和政治信仰等基本向度相互作用的產物，同時也是政治文化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的觀點。關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傳統社會政治變遷的重要機樞，也長期受到學者的關注，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有關清末民初的政治變遷顯得特別劇烈，線索也很複雜，學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楊妍從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這組矛盾概念入手，介入該時期的政治史乃至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深度，顯示了一定的學術勇氣。作者認為在清末民初的特定時段中，地域主義始終與現代國家觀念和認同意識保持相互關係，並與國家認同產生一定張力。在當時傳統帝制解體後，國家認同處於一個轉型期，認同多元而游離，而省籍意識卻躬逢其時，獲得滋長且成為此時構建國家認同的一個嘗試途徑，聯省自治乃至聯邦制的選擇與實驗，均顯示了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間的良好互動。但結局卻是失敗的，因為這種嘗試最終沒能走通，中國政治獨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實現的，由此省籍意識淡出，國家認同愈益強化。

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王朝認同曾是政治認同的最初基本表現形態，人們習稱為「華夷秩序」。王朝即天下，皇帝是天子，忠於皇帝是這種政治認同的最高形式。周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寓示的是天下只是一個統一王權之下的巨大帝國。儒家的理論建構強化了這一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作者指出：「華夷觀念以儒家禮儀文明為標準，在夏夷之間設置了鴻溝，為華夏人設立了一個劣質『他者』的鏡像，在夷狄的反襯下，隨時意識到自己民族的優越性，強化了國家認同意識，同時也為專制王權披上了一層華麗的裝飾性色彩，輝映出帝王代天立極明聖仁義的崇高形象，加強了王權的合法性」；「華夷的內外之別肯定了儒家禮儀文明的主導地位，突出了儒家文化的聚合力」。（頁70）即使遇到外部游牧民族「以夷變夏」的政權更迭，但文化上卻多走向「以夏變夷」，華夏中心主義成為政治文化的一貫路徑。儒家思想也在這種政權交替中增強了包容性與應變性，天下觀念強調將君主個人和社稷、國家區分開來，由此將政治的存續與君主及王朝的更替分離開來，實現了政治認同的一次飛躍。有些人堅定對王朝的認同，衍生出「遺民」現象，但這往往是短暫的。余英時說：「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肯定了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的原則，和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對非我族類的看法是頗罕見的。區別中國和非中國的重點不在種族、血緣而在文化和道德。」（余英時，〈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載氏著，《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1988，頁19。）這表明中國傳統士大夫心目中的國家認同具有了某種世界主義境界。然而，近代以來，以儒家文化和意識形態為核心的華夏中心主義漸漸解體，因為內部呈現出衰敗化，外部則表現為半邊緣化，一方面西方勢力滲入中國，破壞了國家主權，進一步解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另一方面中國通過通商口岸等建立了更多國際貿易市場，引進了先進的技術，更多的西方思想文化形成了對華夏中心主義強烈的衝擊。首先在地理觀念上出現突破，中國並非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存在廣袤的外部世界，而且並不落後，外國人來到中國也不再行稱臣之禮。中國的士大夫直至皇帝均經歷着心理上的巨大考驗，堅守華夏中心觀念越來越失去了立足之地。「華夏中心主義的解體一方面說明，中體西用、保國、保教等以維持傳統文化認同資源為前提的適應性變革，已經不能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國家認同的危機。」（頁80）

種族、語言、地域等因素的差異，均成為華夏中心主義魅力消退之後可

以選擇的認同資源，由此認同呈現出了多元化傾向。漢族人將清朝的建立者滿族作為革命的對象，有時甚至超過了對待外國人。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朝的滅亡，排滿的民族認同便失去了目標和方向。外國勢力因為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引導着現代化的主流方向，且在中國近代實業中佔據較大的份額，因而很難撼動。於是，建立現代國家成為時代提出的首要任務。國家主權的概念漸漸成為合理的構建國家認同的符號，因為現代國家主權所蘊涵的獨立、平等等價值取向，一方面迎合了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現代主權觀念所具有的開放性，使得國民在維持對民族國家忠誠的同時，不會排斥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的，也就是說國家主權這個符號大體上能夠平衡華夏中心主義所遺留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矛盾。同時，主權觀念所要求的對內建立具有最高權威的中央權力，與華夏中心主義中整體國家觀念相一致，容易得到民眾的認同並具有較強的政治動員力量（頁88）。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

國家認同需要強有力的權力中心，需要有凝聚力的精神紐帶，由此主權觀念與現代民主意識得到張揚。但是此時，「清政府中央政權的力量卻極度衰弱。太平天國戰爭使清廷的軍權、財權開始下移，督撫權力開始膨脹，尤其在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役中的失意，使清廷政治權威再次受挫，外交的失利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更是使政府行為偏離認同的主線，導致合法性地位受到質疑。雖然清政府也曾想利用新政改革的機會加強中央集權，但是由於權力的下移和革命排滿思想的傳播，使其對漢人的疑慮不斷加重，政治重心開始向滿人和皇族集權演變，致使政治體制不能吸收和容納新興階層，加上督撫和紳商對皇室集權的反對，清廷加強權力的計劃終於陷於失敗。由此國家建構陷入了一個困境，即以主權等觀念為資源的國家認同，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實現對內的最高政治權威與對外的民族獨立任務，但是清政府的中央權力卻變得極度虛弱，難以承擔起現代化主要推動者的角色，更沒有力量利用新的國家認同資源開展國家建構的行動」（頁91）。固有的地域觀念加進一些自治理念與民主意識，構成了現代國家建構的必要部件，它沒有向現代國家的障礙方向發展，而是在推進國家統一、民主政治建設方面顯示了自己的作用。其目標是「要通過地方自治建立富強文明之中國」，因此，作為地域主義的基本表現的省籍意識因勢興盛，它經歷了由鄉土地緣到省區地域的擴展過程，其指向是現代國家的建構，故「省籍意識不是由國家退到省，而是由鄉土社會進到現代國家的一個中間階段，它是多元認同期建構國家認同的一個路徑選擇」。（頁99）這樣的運思過程符合歷史發展實際。

該書認為在鄉土中國的基礎社會，人們的生存結構呈現明顯的地域性，鄉土性的地域觀念與地方經濟利益結合，很快就會形成政治上的地域主義。清末民初，省作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單位，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各省獨特的風土人情、歷史傳統、地方方言等文化同質性因素，以及在政治格局中特殊的政治、經濟利益要求，形成了以省為空間範圍的認同意識即省籍意識。

正是有這樣的歷史發展邏輯，清末民初省籍意識迎來了其滋長發展的繁榮期。科舉制度尤其是鄉試制度培植起明清以來的省籍意識，明代政壇曾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俗語，明清時期密集設置於京師的各省會館更是省籍觀念滋長的重要溫床，成為「移民鄉井」，鄉土觀念成為支持同鄉組織的精神力量。「北洋時期許多省的會館直接成為政治活動的集會地和演說地。」（頁112）會館儼然成為民國政治活動的基本場所。政治活動家利用會館創辦刊物，則進一步將同鄉意識喚起。留學海外者的基本組織形式依然是同鄉會館，海內外同鄉會館的相互呼應也是清末民初的獨特政治風景。其中公共空間的擴展，如新媒體的滋生，更加快了輿論的傳播與省籍意識的強化進程。

省籍意識是民國初期地域主義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清末民初是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關鍵時期，構建現代國家成為現代化的一個主要議題。作為地域主義表現的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成為影響現代國家建構的一個主要因素。民初的政治形式以現代國家建構為基點，呈現出兩條線索，一條是以民主化為標誌的政治發展問題，具體體現為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再到聯省自治的過程中，制度變革的重心逐漸從中央轉向地方，使政治發展呈現出憲政、共和、聯邦與地方自治的邏輯展開。另一條線索是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由於中央主導力量的缺失以及省地位的上升，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形成了一定張力，在制度發展和選擇的背後存着省籍意識的發展與國家認同的相互關係。它們構成了制度變遷及政治發展的重要政治文化背景。

儘管地域意識在辛亥革命時期仍是革命組織凝聚的基本紐帶，儘管有時地域意識還曾導致革命運動呈分途發展之勢，「但在省籍意識的背後，愛國主義始終控制着地域意識和觀念向分裂的極端發展，各革命組織和志士由於以愛國主義為依託終究殊途同歸」（頁130）。儘管聯邦制理論的傳入給地域主義的發展以理論依據，卻也逐漸達成與國家認同的平衡。

由於省籍意識凸顯，省作為一級行政區劃曾經歷過壓縮的過程，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獨裁者竊取之後，聯邦制、地方自治和聯省自治等觀念紛紛登

臺，力圖以省籍意識抗衡獨裁、弊政與軍閥割據。「聯省自治運動是具有民主色彩的運動，其目的是要實現政治發展模式的轉型，建立與美國相似的聯邦制國家。聯省自治的邏輯是先建立省的自治共同體，在此基礎上由自治省聯合組成聯邦制的國家。這一指導思想促發了省憲運動和國憲運動，省憲運動與國憲運動的展開促進了省籍意識和國家認同意識的雙重高漲，實現了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短暫的互動。」（頁273）

本書總結說：民初省籍意識的發展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第一，它是宗族鄉土社會向城市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地域範圍和認同觀念的一次提升。第二，它是中央權力衰落與國家認同資源轉換的矛盾中，由地方到國家的一種曲折的建構模式。第三，省籍意識為聯邦制與地方自治等現代政治理論的傳播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礎。第四，省籍意識是促成聯省自治運動和聯邦制試驗的政治文化基礎。第五，省籍意識作為影響國家認同的重要亞文化，是省行政區劃設置的文化空間表達，也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礎。（頁273-274）這些論點啟人思考，具有創新價值。

在本書中，作者還具有現實的政治關懷，希望能為現代中國政治提供一些啟示，譬如：中國國家建構必須在建立民族國家推進國家一體化之外，實現向民主國家的轉型；應在強化國家權威之外，給予地方應有的運作空間；應給予社會力量參與政治的機會，中國政治發展史屢屢昭示：政治的清明多是在現代國家、地方直至社會力量的良性互動中實現的。推動中國政治的進步發展，必須實現多元成份的協調。

作為政治學出身的學者，本書作者注重借鑒國外相關理論，注重概念的界定與規範，對於清末至民國時期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這兩個可能相互衝突的觀念間的關係，進行了歷時的政治文化分析，其中不乏對歷史事實的詳盡解剖，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了我國在該時期地域主義主要表現形態之一的省籍意識與國家認同關係的理論框架，具有學術創新價值。倘若能繼續對該時期政治思潮變化與政治現實運行間的關係進行細緻梳理，作者關於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的研究還可以更為充實。

王日根
廈門大學歷史系